

谁主沉浮

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

——为纪念邓拓逝世 20 周年而写

1960 年北京市成立历史学会，当时会长是吴晗，赵征夫（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和廖沫沙先后任党组书记，邓拓是市委管文教和意识形态的书记。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该会当秘书。由于历史学会始终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工作关系就使我和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有过较多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当成“三家村伙计”批判过。邓拓同志含冤去世的消息是从市委发工资时没有邓拓的名字才猜到的。当时我正在受批判，心里很难过，总希望这个猜想是错误的，邓拓也许是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没有死。然而，慢慢地传闻多起来了，邓拓同志确实含冤去世了。他是北京市委机关第一个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今年 5 月是邓拓同志逝世

20 周年纪念日，作为当时的一名青年干部，我曾受过邓拓同志的关怀和教诲，一些往事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良师益友

那是 1962 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市委宣传部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立即到邓拓同志家去。放下电话，我心情很不平静，邓拓是我所景仰的学者，在学生时代，经常站在报廊边拜读他的《燕山夜话》。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邓拓，今天突然通知我去找邓拓同志，心里很高兴，后来却有点紧张了，总在揣度着到底是什么事。我从市委党校骑车到东城的遂安伯胡同 5 号，很庆幸，一路上没有遇到红灯，只用半小时就到了。

进门以后，邓拓同志迎了上来，先是问我怎样来的，是骑自行车还是乘公共汽车。遂后又略带歉意地说：“原先是说我到党校找你，可宣传部的同志说怕你不在。”真没有想到，邓拓同志这样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当他知道我是福建人时，便高兴地说：“我也是福建人，咱们是老乡。”于是话题便转入福建的历史名人和名胜古迹。邓拓同志问我到过万安桥没有，我愣了一下，他忙改口道：“也叫洛阳桥，是北宋蔡襄主持修建的。”洛阳桥是泉州到福州的必经之桥，我当然去过，可就不知道此桥原名是“万安桥”。之后，邓拓同志又谈到晋江安海的安平桥（五里桥）、福州的万寿桥。最后又谈到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清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邓拓同志年轻时代就离开福建，20 多年没有到过福建，可对福建的名胜古迹、山川地理却很熟悉。而我几乎每年回去一趟，又是学

历史的，邓拓同志谈到的古迹有的我并不知道。对邓拓同志的知识渊博我出自内心地钦佩。

“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请你帮忙。”话转入正题，邓拓很客气地说：“能给我介绍一下当前史学界的情况吗？比如，正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各派主要观点是什么，代表人物是谁？”

搞历史学会工作的，至少对学会所属会员的学术观点大体上是清楚的。我按邓拓同志的要求，尽我所知作了一些介绍。当时我的指导思想是，向领导提供学术界的信息，应尽量客观，不应加进半点自己的看法。谈完之后，邓拓点了点头，似乎还比较满意。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道：“史学界的情况，你很熟悉。可是，史学界当前的倾向是什么呢？”我说：“这些讨论对繁荣学术有好处，看不出有什么不健康的倾向。”

谈话结束之前，邓拓同志说：“请你把刚才谈的按问题整理一个书面材料，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尽可能详细摘录下来，防止片面。”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3天之后，我给邓拓送去了7个专题的学术动态。又过了10多天，邓拓同志看到我高兴地说：“很好，7个专题我都看了，还找了几本杂志翻过。史学界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不同学术观点争论是很自然的。”后来，我才明白，邓拓同志是在搞调查研究。当时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有些人把学术界看成一片黑漆，说史学界学术讨论的内容尽是封、资、修的货色。邓拓同志了解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后，诚然他是不会认为北京史学界在贩卖什么封、资、修货色的，他在此后的讲话和作报告中并没有对北

京史学界有过什么批评。

在学习写作上，邓拓同志很反对有始无终，写一篇遇到困难就丢弃一篇的做法。就在一次谈批评英雄史观时，邓拓同志对我说：“文章既然写了，就应修改发表，编辑要学会救活一篇文章，作者自己更应学会救活一篇文章。写一篇文章不容易，写了就应下工夫把它修改出来，修改是提高文章质量的过程，不修改怎么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呢？”一席话把我说得脸上火辣辣的。那时，我刚学写文章，经常写到一半，遇难而退，放了下来。经邓拓这一指点，我写文章时，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硬着头皮写下去，初稿出来之后，就一改再改，改到自己认为可以了再寄出去，一旦被退回来，就下决心再修改，有时通篇文章改到与原稿面目全非，不轻易让一篇成稿报废。

在做研究和写文章上，邓拓同志有丰富的经验。我因工作关系，有幸和他较多地接触，他的一些意见使我颇受教益。记得有一次历史学会召开年会，我写了一篇报道稿，按吴晗的意思，我送去给邓拓过目。邓拓一边看一边改，1000多字的稿子他改了3处文句不通顺的，改了一处写新闻行文程序有误的。改完后，他说：“新闻稿行文和一般文章不一样，开始应该交代一下在什么地方召开什么会，什么人出席，名单应有次序……”此后，历史学会开会的报道稿，只要重要一点的，我都照例送去给邓拓过目，每次他都认真看过，并顺手改了几个字。说实话，我对写报道稿本来并不太重视，因为送到报社以后，编辑是要进行加工删改的，经常写完就寄去，从不打草稿。但是，自从将报道稿送给邓拓审阅以后，我就不敢马虎了，每次都修改到自己满意了再送去，这对我以后提

高文字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学术问题应当自由讨论

邓拓同志一贯主张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通过百家争鸣，进行自由讨论，在争鸣时“应该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普遍流行着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的 6 条政治标准判断学术上的是非，但有些学术观点的是非并不是一时能分清的，用 6 条政治标准又怎能一下子把学术是非分清楚呢？为此，邓拓同志在历史学会的一次报告中又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 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并说：“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邓拓同志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提出是有针对性，是对学术领域里“左”的思潮的一种批驳。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邓拓同志主张学术问题通过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思想是一贯的。1963 年 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对后期太平天国主要将领李秀成全盘否定，把李秀成打成叛徒，说他“认贼作父”。当时中央有位领导同志批评了这篇文章对李秀成作了片面的评价。有些会员希望对李秀成评价进行一次讨论。学会有关领导同意这个建议，正在着手准备举办讨论会。邓拓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就给史学会来了电话，建议不开这样的讨论会。理由是这种讨论会开下去，弄不好就变成围攻作者，形成一边倒的意见，

就谈不上是讨论。吴晗同志认为邓拓的意见是对的，取消了这次讨论会。一年之后，即 1964 年康生、戚本禹之流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在李秀成评价中不同意戚本禹观点的人大加挞伐，把李秀成评价问题说成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是政治事件。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文章就李秀成评价问题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戚本禹又发表第二篇对李秀成评价的文章，气势汹汹，把不同意他意见的人一概打成“替叛徒辩护”，是什么“政治立场问题”。康生、戚本禹之所以这样大作文章，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后批了几句话，其中有“忠王不忠”一句。本来从李秀成自述中有关颂扬曾国藩、贬斥洪秀全的内容，引申出“忠王不忠”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忠王不忠”篡改为李秀成是“叛徒”，并对不同观点进行挞伐，却是居心不良的。在当时情况下，真正的学术讨论根本不能开展。北京市历史学会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召开了一次名义上是关于李秀成评价的学术讨论会，实际上对不同意戚本禹观点的人进行批评。吴晗出席了这个会议，但会没有开完就走了。会后，各报要求发表这次讨论会的纪要，先是吴晗来了一个电话，要我把纪要送邓拓审阅，并表示了他不太赞成登这个纪要的意见。纪要是我整理的，既然吴晗已表示不同意发，就没有必要再送邓拓同志审阅了。当晚半夜过后，大约已两点多钟，秘书长许师谦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邓拓同志给吴晗打了电话，认为：“学术问题不应搞集体表态，登了纪要就等于集体表态。”并说：“以后意见一边倒的学术讨论会最好不开，不利于百家争鸣。”后来，我才知道吴晗回去后用电话向邓拓就这次学术讨论会情况作了汇报并交换了意见，当时邓拓就

表示不赞成对学术问题集体表态。当天晚上邓拓同志又给吴晗打了电话，谈了上面的意见。一次讨论会报道不报道，本来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在当时“左”的势力对学术界进行征剿的情况下，邓拓同志深恐这股风会影响学术讨论、损害学术界的正常研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邓拓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恶风逆浪中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他所领导的工作范围内，顶住康生之流任意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界限的歪风。

艰苦的岁月

1965 年的冬天是一个阴霾的冬天，“三家村”里的邓拓、吴晗、廖沫沙都经历着严酷的岁月。这一年的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从政治上陷害吴晗。吴晗当时已经敏感到：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北京日报》被迫于 11 月底转载了这篇文章，转载就意味着《北京日报》也必须批判吴晗。因此，在转载的第二天，《北京日报》决定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由邓拓、范瑾同志负责，我当时也是这个写作小组的成员。记得第一次会议是在邓拓的办公室开的。邓拓同志当然已经意识到这个“来头”很麻烦，但从大局出发，他违心地担负起组织“批判”吴晗的工作。不过，邓拓同志是坚持学术问题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的。在第一次写作组会议上，邓拓同志没有动员，也没有对形势作任何分析，只是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批评吴晗，吴晗这几年有些文章也是可以

讨论的。”至于写作组的宗旨 邓拓说：“不出题目 大家自己做文章，写什么都行。”当时在座的都有点纳闷，不出题目不提要求，算什么写作小组。原来邓拓同志是有很大的难言之处。上海方面对吴晗的问题从政治上一味拔高，姚文元的文章竟然出了单行本并向全国征订。所谓吴晗的问题，在邓拓看来最多不过是学术问题，由他主持的写作组，他既不能明白说出吴晗是学术问题，又不能违心地把吴晗看成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他只能含糊地让写作组的成员自由去做文章。当时有同志说姚文元的文章所用史料有问题，要写文章对姚文逐条批驳，邓拓摇了摇头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史料问题，你可以谈你自己的看法，不必要去逐条批驳他。”显然，邓拓是知道这个写作小组写出的任何文章也不能扭转迫害吴晗这股逆流的，从爱护写作组的成员出发，邓拓不希望我们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篇短文，提出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将这篇文章送给邓拓，邓拓同志看了神情很严肃，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他那一刹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还像是在眼前。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挑战，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颠倒，“海瑞骂皇帝”这是历史事实，可吴晗并没有也不会“骂皇帝”的。

在写作组，我只写过一篇文章，是和吴晗“商榷”海瑞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这是一篇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文章，编辑部送给邓拓看，他在清样上签署了“可以发”3个字，没有修改，也没有议论。我在他桌上看到这份清样，可我没有如往常那样去问他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他正在写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即从道德继承说到《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文章

把吴晗的道德论和《海瑞罢官》完全当作学术问题来探讨。所谓“有来头”的上海报刊，对吴晗的政治迫害步步升级，邓拓同志却公开亮出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并认为吴晗可以写文章参加这场讨论。后来有人对邓拓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小骂大帮忙”。如果撇开其中包含的另外意思，这个说法却是对的。

写作组的同志陆续在《北京日报》发了几篇文章，大多是用化名，我也用了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笔名。这是因为谁都意识是在违心地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有一次，邓拓问我最近是否见到吴晗。我明白邓拓很关心吴晗的处境，自己又不便过问。第二天我便来到吴晗家里。他情绪很不好，我告诉他市委组织了几个人在写从学术上和他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吴晗听了摇了摇头说：“恐怕没有那样简单，他们是有来头的。”我看到吴晗心情沉重，话很少，只坐了 10 多分钟，说了一句希望他多“保重”，就告辞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从吴晗处回来之后，大约又过了两三天，我看到一份简报，是报告北京大学教授、我的老师邵循正去见吴晗的事。这意味着吴晗已经不太自由了，连谁去看他也要当作一个政治事件上报。因此，我一直没有把见到吴晗的事向邓拓报告。

1966 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市委宣传部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立即回市委，说李琪同志在办公室等我。放下电话，我便从《北京日报》来到李琪同志办公室。他让我坐下，神情很严肃，脸上布满愁云，这使我预感到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果然，李琪在沉默一会之后便对我说：“你不用再到《北京日报》去了，上面点名要批判邓拓同志，由市委抽了几

位同志先做些准备。”真没有想到，批了吴晗，又要批邓拓。在我心目中，邓拓一直是一位形象很高的领导和学者，在理论和学术上，他有许多独到见解，上面要批他，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就问李琪同志：“他主要是什么问题？”李琪同志叹了一口气说：“主要是杂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上面说他借传播知识为名，贩卖封、资、修货色。”李琪脸色深沉，过了一会，他又叹了一口气说：“老邓的问题解决了，咱们的日子就好过点。”从他说话的神色，我明白他是多么希望邓拓、吴晗的问题早点解决啊！遂后，李琪同志让我和市委抽调的几个同志一起先翻翻邓拓同志的文章，做些准备。

不论是邓拓主持“批判”吴晗，还是李琪主持“批判”邓拓，以及两个写作小组的成员，都是被迫在做违心的事。谁也不会认为对方会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谁也就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胡乱上纲。“四人帮”在公开发难之时，把北京市委上述这些做法，诬称为“假批判，真包庇”。说实话，要对邓拓、吴晗从政治上真批判的人确实是不多的。在市委的一个专辟的办公室里，写作组的几个同志每人抱着一本《燕山夜话》、一本铅印本的《三家村札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谁也找不出一个什么尖端问题来。可是，迫于形势，即使不像样的文章也应写出来交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每人才交出一篇被称为很不像样的文章。有人说我写的文章最没有感情、没有文采。其实，心照不宣，我的感情是在被批判的一方，正因为如此，哪怕有一句过头的话，都会感到在受良心的责备。这种感情一直没有转过来，十年动乱开始后，我被当成“反党急先锋”、“三家村伙计”批判。有人曾经一再揭发我的“思想感情仍在‘三家村’一边，没有划清界限”。邓

拓、吴晗、廖沫沙我都熟悉，都有来往。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是党的文化、理论事业上的杰出战士，我当然不会相信他们是坏人。这种思想感情促使我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也没有写过一篇揭发“三家村”的大字报。而在“四人帮”垮台后，能够较早地发表了《评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和《评姚文元的 评三家村 》以及《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 燕山夜话 、 三家村札记 》等三篇替吴晗、邓拓、廖沫沙平反昭雪的文章，并以此来悼念邓拓、吴晗同志。

邓拓同志离开我们 20 年了，邓拓同志的著作《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书已经归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邓拓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垂青于史册，万古流芳。

写于 1986 年

邓拓不同意转载姚文元文章

—— 邓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一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最后一部分无限上纲，说吴晗是鼓吹“单干”的“优越性”是搞“翻案风”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

转载。郑天翔手头没有《文汇报》，让范瑾送来，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理由有两条：一是此前北京市委已经布置过，说上面提出要批吴晗，咱们得批，别人批了，咱们转载也好；二是当时是讲阶级的，这种事要阶级分析。郑天翔是分管工业的，用他的话说：“是搞具体事，是搞砖瓦灰沙石的，什么盖个工厂啦，弄个房子啦，修个马路啦，忙个不可开交。”一个正直的党的领导者，按常规办事，这样处理是很正常的。况且姚文元是一家之言，他的无限上纲在讨论中是会有多少人同意的。天翔同志说：“姚文元的文章后面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我很反感。”他让范瑾转载，并说“登了再说”。“再说”就是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可以讨论。可是，第二天的《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而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观上不免有许多旧的东西。因此，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

去曾说过 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尽管在 1965 年 9 月，即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两个月，在有各大区同志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①见《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后凡引此文称《大事记》彭真说“有些问题”主要是指学术问题。其实，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是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而且明确地告诉彭真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但没有说明性质。彭真当即向北京市委的几位书记作了传达。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文章，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中央的意思，更没有想到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市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知道毛主席曾经提倡“海瑞精神”，也就不认为吴晗有关海瑞的文章能有多大问题。对这件事，郑天翔同志作了生动的回忆：1965 年冬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和万里在出席会议期间，彭真对我说，毛主席要批吴晗，还让批《海瑞罢官》，你要准备准备，总之是一句话：毛主席要批判《海瑞罢官》并让我转告万里。《海瑞罢官》剧本我没有看过，戏我也没看过。我赶紧找宣传部的张大中，让他找了两本，一本给万里。我很忙，硬着头皮看，但看不出问题。在一次会上，要我说说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看不出问题，确实看不出所以然。后来这成了我的罪状，说毛主席要批《海瑞罢官》，你说没有问题，这不是包庇吴晗吗”？其实，不只郑天翔、万里，刘仁也是一样，他们都不以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所以，北京市委对姚文元文章的抵制，在开初只是

一种意念，是无形的，即无计划、无组织的抵制多于有思想准备的抵制。但邓拓、彭真则有所不同，邓拓是管意识形态的，他对这场批判运动应当怎样搞才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当有更多的考虑。

邓拓不赞成转载姚文，并不等于他不赞成从学术观点上批吴晗。姚文元文章发自主上海的《文汇报》，况且姚文元是一根棍子，惯于写批判文章，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篇文章是毛主席让发的。他同样只能按常规办事，即各批各的。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 11 月 13 日，邓拓召集市委宣传部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开会决定：一是摸摸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由来，有什么背景。这一条因上海方面严密封锁而一无所获。二是决定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即由邓拓写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写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三是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同志，彭真明确表示暂不转载。邓拓不同意批吴晗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按这个思路去走，被姚文元文章拉开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便可以稍稍地关上。